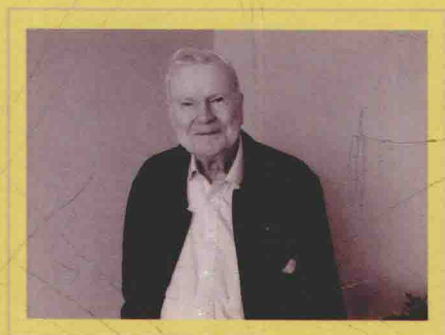


學問

中华文艺复兴论 5

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

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學問

中华文艺复兴论 5

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学问：中华文艺复兴论. 5 / 李森主编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7. 2

ISBN 978-7-5360-8307-3

I. ①学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8431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
责任编辑：林 菁 揭莉琳 刘玮婷
特约编辑：林建法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庄海萌 程俊睿

书 名	学问：中华文艺复兴论 5 XUEWEN; ZHONGHUA WENYI FUXING LUN 5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6 3插页
字 数	240,000字
版 次	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

《学问》丛书学术委员会：

顾问：

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

李欧梵 哈佛大学教授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

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、香港科技大学高级研究员

欧阳桢 (Eugene Chen Eoyang)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

主任：

吴 松 云南大学原校长、教授

委员：

陈安娜 (Anna Gustafsson Chen) 瑞典国家图书馆馆员、汉学博士、翻译家

陈 益 (Samuel Chen) 牛津大学研究员

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

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、教授

达西安娜·菲萨克 (Taciana Fisac)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

贺麦晓 (Michel Hockx) 伦敦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胡晓真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长、研究员

李 森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、《学问》主编

鲁晓鹏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

林建法 《学问》执行主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原主编、编审

刘伟冬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、教授

罗 然 (Olga Lomova) 捷克查理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千野拓政 (Senno Takumasa)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、汉学家

石江山 (Jonathan Stalling) 美国奥克拉马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

王德威 (David Der-wei Wang)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

杨慧仪 (Jessica Yeung)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

叶 波 (Paul van Els)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俞晓群 北京海豚出版社社长

宇文所安 (Stephen Owen) 哈佛大学教授、汉学家

宗仁发 《学问》执行主编、《作家》主编

目 录

中华文艺复兴论坛

- 001 庄 森 鲁迅追随胡适的精彩合作
——新青年社团中的胡适与鲁迅关系研究
- 043 贾晋华 诚之宗教起源
- 057 叶 隼 中国德文学科第三代学者

百家

- 074 [瑞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(Kjell Espmark) 著 王浩 译 翻译灵魂
——现代诗歌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的一条线索
- 095 王凌云 火、烟与不可焚毁的恒久者
——谢尔·埃斯普马克对“焚书”的四重转义
- 105 李 森 李森作品三篇

文心雕龙

- 118 朱 玉 作为听者的华兹华斯
- 134 吴宏娟 王德威：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历史的追溯
- 149 朱振武 李星星 南非英语文学的崛起

诗品

- 169 汪曾祺 著 徐 强 编 汪曾祺诗歌选

192 纪 梅 “看天染蓝了我的眼睛”
——汪曾祺新诗中的色彩和风格

202 张清华 在空白的尽头或背后
——贾平凹《空白》阅读散记

214 一 行 返回之诗：读林白诗集《过程》

游于艺

226 杨小滨 杨德昌电影的精神分析研究（下）

同文馆

239 [美]米家路 著 江承志 译 迷乱的真实：恋物，窥淫与盲视（上）
——海德格尔、德里达和杰姆逊观梵高的《一双旧鞋》

鲁迅追随胡适的精彩合作

——新青年社团中的胡适与鲁迅关系研究^①

庄森

新文化运动中，胡适与鲁迅谁对新文学的影响大？

回归新文化运动的现场评价，答案非常肯定：胡适比鲁迅的贡献大！鲁迅是受胡适文学革命知识权威的影响才给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加入新青年社团，参与创造新文学。胡适创建了新文学的理论，指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，开创了新文学的传统；鲁迅创作了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显示新文学的业绩，奠定了新文学的地位。^②“我们可以说：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，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。”^③

【作者简介】

庄森，苏州大学博士，复旦大学博士后，现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研究员。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、中国现代新闻史。

①[基金项目]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“《新青年》的‘新青年’元叙事研究”（批准号：13BXW007）阶段性成果。本文是在“‘鲁迅在西安’暨鲁迅学术研讨会”（中国鲁迅研究会和西北大学文学院举办 2015.9·西安）上讲演论文。

②庄森：《胡适·鲁迅·莫言：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》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14年第6期，第43页。

③[美]周质平：《光焰不熄：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》，第17页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2。

《新青年》是新文学摇篮，作者群与编辑集体在北京大学形成文学社团，陈独秀与胡适是自然形成的具有向心力的“盟主”。“《新青年》从编辑到内容都追求更富刺激性的热点、焦点，争夺话语权，以激进的‘革命’‘运动’方式推进文学革命。”新青年社团“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以一种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的话语推动文学革命，建设白话文学理论，创造新文学。”^①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难者，文学思想^②成为新青年社团的共名，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。鲁迅尊胡适为文学“革命的前驱者”，紧跟胡适的步调，互动密切，“与胡适确有许多精彩的合作，比如《新青年》的编撰、北大课程的改革、新文学的提倡、小说史的研究，乃至白话诗的尝试等”。鲁迅与胡适“乃互相支持的‘同道’，但很难说是心心相印的‘密友’”。^③

新青年社团形成的主要因素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凝结的知识权威。《新青年》发起的文学革命获得北京大学的支持，逐渐形成知识权威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环聚周围，凝成新青年社团结社的最根本支撑，构成以《新青年》作者、编者为核心的新青年社团。胡适首创文学革命理论纲领，自然位居精神统帅。新青年社团形成时，鲁迅还是周树人——教育部一位默默无名的小科长，但与新青年社团的激进成员钱玄同是同门师兄弟，因而与新青年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周树人受钱玄同“怂恿”，接受胡适文学革命知识权威的影响，尝试创作新文学，反抗旧文学、旧文化，进行思想革命，以《狂人日记》为投名状，加入新青年社团，开启与胡适的精彩合作，用小说显示新文学的业绩。

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，《新青年》移北京编辑不久，钱玄同就积极为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中第一个挺身而出，积极投身文学革命。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，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五号刊发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钱玄同阅后即致信陈独秀说，读了“胡适之先生《文学刍议》，极为佩服。其

① 庄森：《〈新青年〉团体的社团性质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8年第8期，第223页。

② 庄森：《胡适的文学思想》，第72—82页，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13。

③ 陈平原：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，第231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。

斥骈文之不通，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”。^①胡适也说，《文学改良刍议》

“刊出之后，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。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。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。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。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（炳麟）的门人。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，大为赏识，倒使我受宠若惊”。^②钱玄同“极为佩服”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并因此由衷地敬重胡适，真诚与胡适合作，推动文学革命。胡适进北京大学文科任教后，钱玄同常“至大学访适之，畅谈，甚乐”。^③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难者，当然的精神领袖；钱玄同是文学革命的首位响应者，最积极的助产师。这两人“畅谈”的主题肯定离不开文学革命。胡适也强调：“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，独秀、玄同、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，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。”^④

一九一八年一月，钱玄同轮值主编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二号，二日“午后至独秀处检得《新青年》存稿，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，本月五日须齐稿，十五日须寄出也”。当天“在独秀处晚餐”，“归宿舍已十一时”：

略检青年诸稿，有刘延陵论文学二篇，笔杂已甚。又有某氏之论理学稿，推说论理学之名可包名学、因明、Logic，而L不足以尽论理学。这是什么理，真是胡说乱道。还有一篇文章是论近世文学的，文理不通、别字满纸，这种文章也要登《新青年》，那么《新青年》竟成了茅厕外面的墙头，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。哈哈！这真可笑极了。^⑤

钱玄同是新青年社团中最率真的人，嬉笑怒骂皆率性而发，不发违心之言，

① 钱玄同：《致陈独秀》，1917年2月1日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“通信”。

② 胡适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《胡适文集》第1卷，第320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。

③ 钱玄同1917年9月19日日记。《钱玄同日记》（上），第317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④ 胡适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〉导言》，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建设理论集》，第22页，上海：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，1935。

⑤ 钱玄同1918年1月2日日记。《钱玄同日记》（上），第326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不做违心之事。轮值主编《新青年》，看到稿子质量不高，极为不满，狠狠嘲笑一通后，想到必须另辟途径，挖掘新作者，于是多次亲临“S会馆”，“怂恿”周树人给《新青年》撰稿，^①从而推出鲁迅，开创了新文学的新时代。

钱玄同与周树人是留日同学，师从章太炎，两人来往密切。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，钱玄同日记云：“今日尹默、幼渔、我、坚士、逖先、旭初、季葑、预（豫）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，谈宴甚欢。”^②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章太炎住所的“门警撤去”后在京章门弟子第一次聚会。鲁迅日记也有记载：“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，晚归。”^③仅仅过了二周，章门师徒又再次聚餐。二月十四日，钱玄同日记又云：“晚餐本师宴，同座者为尹默、逖先、季葑、豫才、仰曾、夷初、幼渔诸人。”^④一九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是中秋节，钱玄同“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”，出门访客，“午后二时访蓬仙。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、启明。蓬仙先归，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。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”^⑤。可见双方谈兴甚浓。鲁迅当天的日记更加有趣：“朱蓬仙、钱玄同来。张协和来。旧中秋也，烹鹜沽酒作夕餐，玄同饭后去。月色极佳。”^⑥这种佳节的私人聚会，非密友不会相约相聚，可见钱玄同与周树人私人关系密切，相互了解、相知。

钱玄同如何“怂恿”周树人给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因没有史料记载，后人无法详知。但有一点非常肯定：周树人决非因为认同《新青年》、认同陈独秀而撰稿。钱玄同“怂恿”周树人之前，周树人就阅读了《新青年》，但没有半句赞誉。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，鲁迅日记记载：“上午寄二弟《教育公报》二本，

① 鲁迅 1917 年 8 月 9 日日记：“下午钱中季来谈，至夜分去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 15 卷，第 292 页。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）此日后，钱玄同还多次找周树人约稿。鲁迅 1917 年 8 月 17 日日记：“晚钱中季来。”鲁迅 1917 年 8 月 27 日日记：“晚钱中季来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 15 卷，第 292 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）

② 钱玄同 1915 年 1 月 31 日日记。《钱玄同日记》（上），第 279 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③ 鲁迅 1915 年 1 月 31 日日记。《鲁迅全集》第 15 卷，第 158 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④ 钱玄同 1915 年 2 月 14 日日记。《钱玄同日记》（上），第 281 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⑤ 钱玄同 1917 年 9 月 30 日日记。《钱玄同日记》（上），第 319—320 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。

⑥ 鲁迅 1917 年 9 月 30 日日记。《鲁迅全集》第 15 卷，第 296 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《青年杂志》十本，作一包。”^①这说明《青年杂志》创刊之初，周树人就看到这本杂志，不寄给周作人看，证明并不认同它。这一次打包寄去十本，也仅是推荐给弟弟阅读。周作人认为：“鲁迅早知道了《新青年》的了，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。那年^②四月我到北京，鲁迅就拿几本《新青年》给我看，说是许寿裳告诉的，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，颇多谬论，大可一驳，所以买了来的。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，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，所以也随即搁下了。那时《新青年》还是用的文言文，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，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，在那里骂封建的、贵族的古人。总结的说一句，对于《新青年》总是态度很冷淡的，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。”^③一九一七年九月，许寿裳长江西省教育厅。周树人给许寿裳的信虽多次谈到《新青年》，但没有一点褒义，有的也是贬的情绪。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，周树人给许寿裳的信说：“《新青年》以不能广行，书肆拟中止；独秀辈与之交涉，已允续刊，定于本月十五日出版云。”^④周树人强调“《新青年》以不能广行，书肆拟中止”，表明不看好《新青年》，更不欣赏“独秀辈”。

《新青年》此时确实面临生死困扰。因为销路不好，第三卷出完后，群益书社决定停刊。陈独秀几经交涉，并答应放弃编辑费及稿费，群益书社才答应续刊。休刊四个半月后，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一号出版。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二号出刊，周树人寄给许寿裳并附信说：“《新青年》第二期已出，别封寄上。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，不取值，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。”^⑤《新青年》因销售不好“不取值”，因而大量寄赠读者。周树人寄赠许寿裳的《新青年》，应是钱玄同赠阅。钱玄同回忆说：“陈、胡、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，主张文学革命。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。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，‘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’，‘文章应该用白话做’，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。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，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《新青年》

① 鲁迅 1917 年 1 月 19 日日记。《鲁迅全集》第 15 卷，第 273 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② 指 1917 年。

③ 周作人：《鲁迅的故家》，第 355 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。

④⑤ 鲁迅：《致许寿裳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11 卷，第 357、360 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写文章……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，于是他的《狂人日记》小说居然做成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。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。”^①后人都据此肯定，周树人是受钱玄同的“怂恿”才创作《狂人日记》。

钱玄同的“追忆”透露出“怂恿”周树人的话语主旨：一是“文章应该用白话做”；二是“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”。这二者都是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，新青年社团的文学革命知识权威的核心。钱玄同既是周树人同乡又同是章太炎学生，两人相知相信，周树人自然接受其“怂恿”。另外，钱玄同此时在学界影响比周树人大，既是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学生，也是今文经学大师崔适的学生，三十岁就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，《新青年》“编辑人中，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，学有本源，语多‘行话’，振臂一呼，影响更大”。^②周树人最终接受钱玄同的“怂恿”，尝试“用白话做”打倒不合理的“旧文化”、旧传统的新文学。鲁迅对此也这样回忆，“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”，总劝我“做点文章”。鲁迅说：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在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对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悉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……^③

① 钱玄同：《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6年10月26日。

② 曹述放：《钱玄同先生年谱》（上）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5期，第93页。

③ 鲁迅：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440—441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鲁迅的回忆透露出三个信息：其一，鲁迅确实因钱玄同的“怂恿”才给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创作《狂人日记》。但周树人能接受钱玄同的“怂恿”，却是服膺胡适的文学革命知识权威，响应文学革命，反抗传统，为获得“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”。陈思和对此曾精辟地指出：“鲁迅虽然被钱玄同说服而答应为《新青年》写文章，却没有被说服放弃自己所以为‘必无’的悲观，他对自己的经验使用了‘确信’、‘必无’等词而对钱玄同的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只使用了‘所谓可有’四个字，语气的坚定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他只是愿意通过写作实践来克服内心深处的‘无聊’之感，期待‘希望’或许会成功。这就决定了鲁迅参加《新青年》的战斗在思想情绪上与《新青年》同仁是不同质的，他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与《新青年》同仁们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也是不同质的。”^①

其二，周树人全因钱玄同“怂恿”才创作白话小说，“最初的一篇”《狂人日记》就是由钱玄同催促而成。鲁迅“那时对于‘文学革命’，其实没有怎样的热情。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”。但鲁迅赞同胡适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，既受新青年社团成员的文学革命激情感染，又“大半倒是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。这些战士，我想，虽在寂寞中，想头是不错的，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”。^②所以，没有钱玄同“怂恿”，不接受胡适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影响，周树人肯定不会“用白话做”主旨为“打倒”“旧文化”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反抗传统。因为“‘铁屋子’的意象，是从他的寂寞里产生出来的。但也可以反过来说，钞古碑、读佛经，沉入到国民中，回到古代去，这些寂寞之状恰恰来源于对‘铁屋子’的感知。如果革命、变革、启蒙是无用的，那么，它们与钞古碑、读佛经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‘铁屋子’的意象难道不正来自于他早先对新知、新生的理解和忠诚，来自于他‘走异路’的决意吗？因此，‘铁屋子’的说法也正是他‘苦于不能全忘却’的注解，证明他的心底里奔涌着与金心异相同的河流。如果没有这条奔涌的潜流，钱玄同所说的‘希望’便不会在他的心头引发震颤”。^③因为周树人客居“S 会

① 陈思和：《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》，第42—43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3。

② 鲁迅：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468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③ 汪晖：《鲁迅文学的诞生——读〈呐喊·自序〉》，《现代中文学刊》2012年第6期，第36、39页。

馆”，“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”。^①绝对不会想到“用白话做”小说，奋起反抗旧文化、旧传统。其三，鲁迅的创作是为了“敷衍朋友们的嘱托”。这“朋友们”自然不仅是钱玄同一个人，而是新青年社团的团体，认同文学革命反抗传统的知识权威，才加入新青年社团“毁坏这铁屋”的队伍。鲁迅说：“我做小说，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，《新青年》上提倡‘文学革命’的时候的。”点明“做小说”是响应胡适的“文学革命”，追随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创造新文学。鲁迅还怕读者看不明白，进一步突出强调：“我的作品在《新青年》上，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，所以我想，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‘革命文学’。”特意突出“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”，承认服膺胡适的文学革命知识权威，是新青年社团文学革命的一部分，并强调“这些也可以说，是‘遵命文学’。不过，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，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，决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”。^②鲁迅清楚挑明，创作《狂人日记》“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”。毫无疑问，胡适是当时公认的文学革命“前驱者”。鲁迅还特别强调，不是胡适鼓动他，而是他“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”。汪晖认为：“‘听将令’似乎是说他的文学动力是外在的，与文章开头提及的未能全忘却的梦有些矛盾。我刚才提到了鲁迅世界中的鬼，以及他对异路、异地和别样的人们的追寻：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从他的‘自我’中产生的，而是从一个他力图探索的既无法摆脱又无法控制的世界中诞生的。我们或许还记得《野草·过客》中那个一再出现的、却只能为过客所听见的声音吧？那个声音是内在的，还是外在的？我们分不清。‘将令’是内在的，还是外在的？我们也分不清，但可以肯定：它是能动的，异己的，却又潜伏于近乎被忘却的记忆里。对于鲁迅而言，‘将令’只有转化为内在才能成为‘将令’。这不是对外部或集体的排斥，这是对自己的信念的忠诚。我把这称之为幽灵的能动性，或者‘幽灵的不对称性’。它牵引着鲁迅介入现实的斗争，介入他有时想要拒绝的政治。”^③所以说，鲁迅加入新青年社团虽是钱玄同一而再、再而三“怂恿”的结果，但

① 鲁迅：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440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② 鲁迅：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468—469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

③ 汪晖：《鲁迅文学的诞生——读〈呐喊·自序〉》，《现代中文学刊》2012年第6期，第39页。

与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不无关系，是受胡适文学革命的知识权威影响所致。

周作人也认为鲁迅加入新青年社团，钱玄同的“怂恿”仅是诱因，内因是鲁迅完全被文学革命反抗传统的批判精神所吸引，激发“办《新生》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”。文学革命是胡适文学思想的核心。“胡适的文学思想以自由思想为思想资源，立足文学进化论的立场，强调白话是文言的进化，把白话作为国语文学的工具和利器，反抗传统，倡导新文学通过语言工具的革命，彻底摧毁守旧的、承载封建思想、传统文化的文言语言工具，催生一种承载新思想的白话工具，取得言说的自由、能自由地表达思想、抒写情感，传播现代的思想观念，彻底颠覆了统领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文言文学的正宗地位，构成‘异军突起’的基本发生形态”，^①影响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。周作人说：“夏夜那一夕谈之后，鲁迅忽然积极起来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，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，这是他从想办《新生》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，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，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，便立即爆发起来了。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！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，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，乃是‘打倒纲伦斩毒蛇’，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，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。”^②周作人强调，鲁迅完全是投奔《新青年》“打倒吃人的礼教”的“思想革命旗帜”。新青年社团的文学革命实质就是反抗传统的思想革命。陈独秀就强调：“今欲革新政治，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。”^③文学革命的目标是以文学改造人心，进行启蒙，水到渠成完成思想革命，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，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。因此，“《新青年》同人所以提倡文学革命，本来就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虔敬，他们不过想从这里打开缺口，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。白话文运动岂止是文学语言的变革？它分明是整个社会书面语言的变革。陈独秀们嘴上的‘文学革命’，其实是和‘思想启蒙’同一含义的。因此，他们自然不会觉得文学有什么特别，不会因为自己缺乏文学才能，就不敢来谈文学，恰恰相反，他们还捋起袖管，吟诗，作文，写剧本，为新文学创作样版作品。他们也自然要特别来讨论文字和思想的关系，

① 庄森：《胡适文学思想的先锋性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9期，第72页。

② 周作人：《鲁迅的故家》，第355—356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。

③ 陈独秀：《文学革命论》，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，1917年2月1日。

强调文字的工具性”。^①蔡元培也肯定：新文化运动的路径是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。“为什么改革思想，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？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。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《致陈独秀书》，有云：‘旧文章的内容，不到半页，必有发昏做梦的话，青年子弟，读了这种旧文章，觉其句调铿锵，娓娓可诵，不知不觉，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。’在钱玄同所主张的‘废灭汉文’虽不易实现，而先废文言文，是做得到的事。所以他有一次致陈独秀的书，就说：‘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，则自己在《新青年》里面做的，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。我从这次通信起，以后或撰文，或通信，一概用白话，就和适之先生做《尝试集》一样意思。并且还要请先生，胡适之先生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。’”^②从语言工具变革开始的文学革命因而演变为思想革命，成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鲁迅认同文学革命这种反抗传统的批判精神，所以，交出的第一篇作业就是揭露礼教吃人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投身“看待极重”的“思想革命”，用文学奠定政治思想革命基础，推动中国文学由文言工具到白话工具、思想方式由传统到现代形态的范式转化，表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互相依存，突出新文化运动深刻的整体一致性。

《狂人日记》的发表，使鲁迅横空出世，登上新文学的舞台。文学史家不管怎样评价这一史实，都无法否认一个不争的事实：新青年社团催生了鲁迅，^③《新青年》为鲁迅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最好的基地，并把周树人铸造成鲁迅。^④鲁

① 王晓明：《一份杂志和一个“社团”——重评五四文学传统》，《上海文学》1993年第11期，第72页。

② 蔡元培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总序》，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建设理论集》，第9页，上海：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，1935。

③ 许寿裳就强调是钱玄同“催促怂恿”鲁迅创作小说，因此改变了鲁迅的生活。许寿裳说：“我自民六秋，于役南昌，和鲁迅别开三年。在这中间，鲁迅的生活起了大变化。前后可划分为两段：前者是摩挲古碑，后者是发表创作。这个变化即发表创作，是《呐喊》序文所谓‘老朋友金心异’——按即钱玄同——的催促怂恿与有力的。创作的开始在民七四月，发表在同年五月号《新青年》。”（许寿裳：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，第47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3。）

④ 许寿裳说：民国九年的年底，他和豫才谈到笔名鲁迅的来历。鲁迅告诉他，说：“因为《新青年》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，我从前用过‘迅行’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，所以临时命名如此：理由是（一）母亲姓鲁，（二）周鲁是同姓之国，（三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。”（《许寿裳文集》上卷，第38页，上海：百家出版社，2003。）

迅就说：“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。我所用的笔名也不止一个：LS，神飞，唐俟，某生者，雪说，风声；更以前还有：自树，索士，令飞，迅行。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，因为那时的《新青年》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。”鲁迅解释“鲁迅”的由来后，又说：“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，‘鲁迅即周树人’，是别人查出来的。这些人有四类：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，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；一类单是好奇；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，所以特地揭出来，想我受点祸；一类是以为于他有好处，想要钻进来。”^①当然，这四类人都不包括本就知道“鲁迅即周树人”的人。因此，完全可以说：没有新青年社团，就没有鲁迅。鲁迅从《新青年》走出，走向全中国、全世界。

二

鲁迅不仅受胡适文学革命知识权威的影响创作新文学，而且《狂人日记》的创作完全按照胡适设计的新文学观念、体式、语言的路径进行。胡适认为，文学的进化不会一帆风顺，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。“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还强调文学有一个自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。‘自然的趋势逐渐实现，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，那便是自然进化。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，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，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，那便是革命了。一切文物制度的变化，都是如此的。’胡适运用这种文学进化论重构中国文学发展史，认为从《诗经》到词、曲的每次进化，‘初看去似乎很激烈，其实只是《三百篇》以来的自然趋势’。依照这种文学进化论，新文学是中国文学自然进化的一环，是文学自然进化的必然产物。这种文学进化论成为否定文言文，提倡新文学的重要思想武器，但是文学的自然进化不会一帆风顺，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。‘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，便停住不进步了；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，有了比较，无形之中受了影响，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长处，方才再继续有进步。’没有互相接触和影响，文学会停止不前。胡适以文学语言能否自由表达情感、思想作为衡量文学进化的标准，发现西方文学已进化到较高级阶段，中国文学相比较还停留在较低级阶段，所以主张西方文学是中国文学

^① 鲁迅：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395—396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。